

林庚在厦门期间的史料考证与佚作辑释

刘锐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 对林庚在厦门期间(1946年6月至1947年7月)相关史料的考证,在此前的林庚研究中基本属于空白。在此期间,林庚不但坚持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而且将自己的新诗教育成果在地方报纸上完成了一次集体亮相,此后又参与发起并创办了《灯塔》月刊。此外,散佚在厦门地方报刊上的3首新诗的发掘、《关于写〈中国文学史〉》一文的重新辑考以及发表在厦门的“谈诗稿”的发现,这些史料及佚作为林庚文学创作与学术思想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材料,对于厦门地方文学史、学术史研究也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关键词] 林庚;在厦期间;史料考证;佚作辑释

[中图分类号] I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89X(2023)01-0076-08

“七七事变”后,林庚受时任国立厦门大学(以下简称厦大)校长萨本栋之邀,于当年9月南下任教。随后日军南侵,1937年底,厦大开始从鹭岛海滨西迁长汀山城,林庚随校任教,直到1946年五六月间,才随厦大迁回厦门。1947年夏,林庚辞去厦大教职北上,此后近60年一直生活在北京,先后任教于燕京大学及北京大学。不论是林庚自述还是传记叙写,所谓“厦大十年”,实际上近9年时间在长汀,是在战时西迁状态下继续自己的诗歌探索和文学研究,而真正较为稳定地在厦门生活的时间只有一年多。也许,对于厦门和地处鹭岛海滨的厦大而言,林庚只是一个匆匆过客,但林庚在厦门期间的史料,在此前的林庚研究中基本属于空白,其作品也有散佚。以下笔者就翻阅厦门地方报刊与厦大校史资料时新发现的林庚在厦门期间(1946年6月至1947年7月)的史料进行考证,并对散佚的相关作品进行辑佚。这些史料及佚作为林庚文学创作与学术思想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材料,对于地方性的文学史研究也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一、从《寤言》副刊到《灯塔》月刊

以往关于林庚的研究或传记书写,似乎多是从“厦大十年”(1937—1947)直接跨越到“燕大五年”(1947—1952),是从长汀直接到北京,而相隔于此间的厦门,不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都鲜有人关注,之所以如此,其原因不外乎相关史料的阙如。

从1946年夏随厦大复员,到1947年夏辞职而后北上,林庚在厦门度过了整整一年。相比于此前因战时避乱而半隔绝于长汀山城,到此后回归北平而重整文学旗鼓,厦门一年于林庚而言,自然有转折与过渡的意义。长汀时期,厦大地处山城,林庚后来回忆说,“那里与外界几乎是处于半隔绝的状态,我写了诗基本上无处发表”,“但我决心坚持不让它中断,我在厦大曾先后两次开过‘新诗习作’的选修课,也是为了争取更多写诗的条件”^[1]。刘涛辑自《厦门大学学报》(1943年第2期)所载的林庚长篇佚文《新诗形式的研究》^[2],展现了一个当时饶有意思的现象,一方面是发表难,一方面又坚持创作,所以林庚只能将自己的新诗创作,纳入到自

己的学术论文中充当例证，这既满足了论证的需要，又让自己的新诗作品在学术刊物上得以“发表”，可谓“曲线救国”。所以，抗战结束后，随校迁回厦门的林庚，可以说颇为珍惜来之不易的安宁，一方面继续着新诗的创作，另一方面也积极进行各种创作之外的文学活动。

林庚在长汀环境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依旧以开“新诗习作”选修课的方式，让新诗创作的火种赓续。这其实涉及林庚新诗教育的问题，但由于此后林庚未有具体回忆以及相关资料的匮乏，甚至是空白，这一问题并未被纳入到林庚研究的视域当中去，而此次新见林庚在厦门期间的文献，正好可以让我们顺着上述林庚的回忆，重返历史现场。

长汀时期，虽然有“新诗习作”课，但林庚连自己的作品都难以发表，更遑论学生习作。故而回到厦门的林庚，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中，寻找机会让自己和学生的新诗作品来了一次集体亮相，于自己而言，更像是一次对多年来新诗教学成果的展示。林庚看准的是抗战胜利后在厦门复办的地方大报《星光日报》。《星光日报》是20世纪前半叶厦门当地发行量较大、影响较为广泛的地方报纸，于1935年由华侨胡文虎出资创办，是胡文虎“星”字系列报纸之一。《星光日报》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都办有各种副刊，主要是因为这一时期报社开门办刊，除了报社自己经营的副刊外，也定期将版面让给其他的专业团体，以此组稿，办出更为专业、质量也更高的副刊。这些版面当中，就有专门开辟给厦大中文系的版面，所以，在1946年厦大复员不久，于6月24日，由厦大中文学会厦门分会主编的《寤言》作为《星光日报》的文艺副刊，正式创刊，不定期出版，成为厦大师生（以中文系为主）谈文论艺的阵地。

1946年11月11日，新一期《寤言》出版，与以往编号出版不同的是，这一期《寤言》是“新诗特辑”，一次刊出新诗12篇，作者中除了林庚之外，其余都是厦大学生。编者在版末加了一篇《小启》，写道：

在这里我们大胆地刊出了《新诗》的专号，除了林庚师的作品外，我们不知道这些篇章是否真的成“诗”，希望读者们提供给我们意见。

此次收到诗稿很多，不能一次刊完，当待下期陆续发表，特向各诗作者致歉。

从这则《小启》中，不难看出编者即林庚的学生，将集体亮相的新诗作者分为“林庚师”和“我们”，相对应的是“林庚师的作品”和“我们”这些不知“是否真的成‘诗’”的“篇章”。这对于老师而言是“教学成果展”，对于学生来说则是“新诗习作展”。既然林庚在厦门的这个文学活动，如笔者上述所言，涉及其新诗教育的问题，那么，我们不妨再进一步考察，林庚的新诗教育成果到底如何？与其诗学和新诗创作之间的联系又是否密切呢？

考察此问题，当然首先要明白林庚在20世纪40年代的创作和诗学思考，诗歌的写作毕竟还有其技术层面的“技艺性”，而这些恰恰会由老师通过自己的创作示范和诗学宣叙，直接传递给学生，直接影响到学生习作。作为同时代人的王西彦，曾针对当时站在厦大讲台上教授新诗的林庚有过批评，说“也有人站在大学校的讲台上奉劝青年钻入‘绝世的沉静’”，而“绝世的沉静”正是出自林庚新诗《冬青》之末句——“轻轻的幻想吧绝世的沉静”。有研究者在对以上王西彦的林庚新诗批评做出钩沉后，对林庚新诗进一步的判断集中在2个方面，（1）旧诗词意境的延续，“越到后来他的诗意便越淡薄，差不多只是‘蓝天’‘春野’‘流水’‘大海’‘秋日’‘黄昏’‘惆怅’‘寂寞’等有限的几个意象和辞藻的反复组合”；（2）苦心为新诗所建的标准诗行，“始终束缚在古典诗词的‘言数’（五言、七言、九言等等）传统之下”^{[3]156-157}。

结合以上2种判断，我们不妨再列出《寤言》“新诗专号”中除林庚作品以外的诗作，共11篇，分别有《蓝天》《海》《天象篇（太阳、圆月）》《东方美人——雨丝》《冬的呼唤》《水属篇（帆、橹、蒿、桨、锚）》《骊歌》《和骊歌》《幸福的疯子》《我曾见过一部吉普卡》。只看学生习作的这些题目，其中许多就与林庚新诗中几种反复书写的旧诗词意境极为相似，再细审诗句，基本上多是林庚的路数，缺乏丰富的生活体验和对社会的批判意识，况且还没有林庚的诗才，多是几个简单的意象翻来覆去，个别甚至是无病呻吟之作。应该说，林庚师生作品的这次集

体亮相,并不算成功,据编者《小启》可知,因为收稿不少,所谓“新诗专号”还有1期,从目前笔者所见厦门图书馆所藏《星光日报》来看,后面1期“新诗专号”已佚。所佚的这期“新诗专号”,除了不能确定是否有林庚的诗作外,基本上可以推断,所刊新诗的水准和前一期“新诗专号”差不了多少。

而厦门图书馆所藏《星光日报》副刊《寤言》也仅存6期,最后1期《寤言》(第12期)出版于1947年11月25日,版末有编者《关于〈寤言〉》一文,其中说:“《寤言》于今是十一岁的孩子了。十二期来,因为生活的条件欠缺,这孩子确长得比较瘦小,但却是很轻巧地活跃在南中国的艺坛上”,“但近来,我个人的身心很不安宁,我想我必得离开这孩子而去,□^①特地写下这篇简短的文字,为孩子做一块划时期的纪念碑!”^[4]一块难得的文艺园地终刊于此,基本上是将厦门抗战之后为数不多的一点新诗亮色给抹去了。厦门于新文学历史上虽然有过1937年6月在蒲风关怀和指导下成立的厦门诗歌会。但此后抗战开始、厦门沦陷,再到抗战胜利后各种文化教育机构迁回厦门的一两年内,除了雷石榆在《闽南新报》上刊发的相关作品外,厦门的新诗创作,可谓是荒芜已久,所以编者《小启》中所谓“大胆地刊出”,并非只是说学生的新诗习作难以拿出手,其背后更有一个接受环境的问题,因为彼时厦门的诗坛多以旧诗创作为主。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来看林庚与其学生的这次“新诗展”,却又别有意义,这不但是林庚文学生涯中一次很特别的文学活动,还为厦门战后的新文学增添了活力,如今虽然已经很难再揣测林庚当年的出发点,但客观来讲,这是林庚在厦门短暂的期间,留下的可被铭记的一笔。

但林庚为自己及学生寻找新诗阵地的欲求,并未随着《寤言》的终刊而终结。从在长汀时的难以发表,到厦门期间的挂靠大报,总会有诸多不便。这或许让从来置身事外,悠游于自家思想天地的林庚,意识到有一块文学阵地的必要性,所以,林庚在厦门期间还发起并参与创办了

《灯塔》月刊。

要说《灯塔》月刊,此前并未真正进入过研究者的视野,2005年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林庚诗文集》(全九卷),其中一册收录了林庚各种诗集及集外诗歌,但并未见《灯塔》月刊踪迹,直到此后解志熙在《诗文集》的基础上继续辑佚,辑得一首题为《爱的河流》^{[3]89-90}的新诗,并披露发表在《灯塔》第1卷第6期上,但在其相关校读文章中,并未对《灯塔》作相关说明,而此后的研究文章中也未提及此杂志。

1946年12月31日出版的《厦大校刊》第1卷第8期上,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题为《本校教授陈烈甫等创办〈灯塔〉月刊将于卅六年元旦与读者见面》,全文如下:

本校教授陈烈甫,陈文藻,林庚诸位先生,为提倡文艺,鼓励青年写作起见,近创办一最新型刊物,定名为《灯塔月刊》,^②内容有国内政治的评论,有国际时事的评述,有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的专论,有诗歌文艺的作品,并从事指导青年思想,介绍现代智识,探讨当前问题,讽刺社会病态,为一综合性政治性之刊物,创刊号定元旦与读者见面,闻第一期各篇材料,至为丰富云^[5]。

虽然《灯塔》月刊由包括中文系教授林庚在内的几位厦大教授合办,却很难将其定性为同人杂志,只能说是最初的创办人都有各自开辟一块媒介领地的欲求,所以合计创办一本综合性刊物,但为了体现时代诉求,将其主调定位为政治性,况且月刊的主编陈烈甫是厦大政治系教授,从而每期内容也都以政治经济方面的评论和研究为主。从创刊号开始,这种倾向就比较明显,创刊号共13篇诗文,除了林庚的1首新诗和虞愚的1篇杜诗专论外,其余11篇皆属于政论方面的文章。所以,这个刊物的走向,至少与作为创办人之一的林庚“提倡文艺,鼓励青年的写作起见”的设想,差别越来越大。笔者推测,林庚最初参与《灯塔》月刊创办的动因,很大程度上是在对长汀期间,创作、发表及整个诗歌环境之艰难的一种补救,认为战争结束了,回归到

① 原报此字漫漶,难以辨识,疑作“才”或“故”。

② 此处原无“,”,为笔者所加。

鹭岛海滨，一切条件都好过山区，便应该有更好的创作环境，然而林庚并没有主导这个刊物的能力。目前所知《灯塔》月刊共出18期，每6期为1卷，出至1947年7月的第1卷第6期时，林庚在上面也仅发表过2首新诗，而此时林庚也已辞去厦大教职准备北上。此后的《灯塔》月刊，也很难谈得上“提倡文艺”，最亮眼的也不过是偶尔请中文系教授客串一把，如徐霞村的翻译而已。

故而从《寤言》到《灯塔》相关史料的发现，让我们可以在70多年后，对林庚在厦门期间的文学活动有个重新的认识，不至于将目光仅停留在其新诗创作上，还可以看到其在这一时期文学教育和创办刊物的诸多历史细节。

二、新见三首佚诗辑释

笔者查阅林庚在厦门期间的相关史料时，顺便辑得其新诗3首，经核准，这3首诗未收录于2014年6月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林庚诗集》^①，此后的相关论文中也未见提及，当属林庚佚诗。它们分别是发表于1946年9月16日《星光日报》副刊《寐言》第8期的《绿的路》、1946年11月11日《星光日报》副刊《寐言》“新诗专号”的《椅》、1947年1月1日《灯塔》月刊创刊号的《自由的号手》，现将3首佚诗辑校如下：

绿的路

儿童的心境像行云
停留在随意高冈^②上
他无意间变为少年
惊讶于世界的变换
园林的梦寐的清晨
走出绿色春荫的门
街上是往来的行人
鸽子低飞过远的城

在一个邮政箱旁边
一群陌生的旅客们
他们在寻着指路牌
当无轨的车子走来
白色的羽翼飞翔着
树木下谦虚的主人
从一座精致的屋子
送走他少年的同志

柳枝作马上的客邸
当拂着少年的肩膀
而海上渔夫的梦寐
点染过不同的山峰
描绘那脆弱的记忆
原上的白云细细的
谁吹起如梦的号声
解释人生的梦与真^[6]

椅

一天我走进一座旧王宫^③
那里有一个高高的宝座
上面安放着一张大木椅
不知什么人在上面写着
“我活着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要美丽的生
如同我要美丽的死”
现在这椅子再没人理会
并且就谅它长久的放着
于是我走进一家家具店
买了这一把藤制的圈椅
我想在上面也来题些字
放在阳光下适意地坐着
可是这椅子实在是太新
没有个字适宜于题上^[7]

① 《集外集》部分由孙玉石重新校订，已收入此前解志熙、刘涛等人的辑佚成果。

② 疑作“岗”。

③ 疑作“宫”。

自由的号手

自由的号手你唱出
你难以忘情的叛徒
自由的号手你唱出
你永远殷勤的字句
你带我到绿的草原
说那里正宜于征战
你带我到青的山头
说人生原为了企盼
在山与草原的那边
我们昔日的伙伴们
他们正在被人遗忘
自由的号手你歌唱
让一只带血的号声
说生命是一个呼唤
从辽远广阔的地方
落在我幼穉的心上
自由的号手你歌唱
说人生正为了征战^[8]

目前所见林庚在厦门期间的新诗,共计6首:除了以上3首,此前所见有1947年7月发表于《文学杂志》第2卷第2期上的《冬之呼唤》(此后收入《问路集》)、解志熙辑自《灯塔》月刊第1卷第6期上的《爱的河流》和李牧新近披露的发表在1947年4月4日《明日文艺》第1卷第6期的《复仇的日子》^[9]。但李牧相关文章中关于《复仇的日子》与《明日文艺》的说法有误,《复仇的日子》并不属于林庚在长汀时期因难发表而托人带出刊载的作品,恰恰是抗战结束林庚回到厦门后,较为容易发表作品的例证。这就要说到《明日文艺》,李牧文中出版地标注为“莆田”,其实《明日文艺》只是创刊于福建莆田,第1期(1945年12月15日)的发行人兼主编是曾迺硕,从第2期(1946年5月1日)开始,社址迁往厦门,主编为赵天问。第3、4期合刊,主编改由许虹担任,一直到1947年4月4日第6期都在厦门出版。此外,据徐学《厦门新文学》记载,《明日文艺》共出7期,第7期以赵天问主编的名义出版^[10]。

林庚在厦门期间的6首新诗,其中有5首刊于厦门地方报刊上,只有1首发表在外地。所以,1948年林庚编《问路集》时,发表在厦门地方报刊的5首,皆成了集外遗珠。这很可能是因为林庚北上后,并未留有刊发在厦门的5首新诗的手稿和原报刊,而《文学杂志》是当时的名刊,发表在此中的新诗,甚至包括在长汀末期(1946年4月4日)所作新诗《黎明的对话》^①,都顺利被辑录进入诗集。由此可见,遗落在厦门的5首新诗,在1948年未被林庚收入《问路集》,并非是诗作不成功,而是由其他客观原因所造成的。

这6首诗大体上与上文所引述研究者的判断一致,即如此前已见《冬之呼唤》《爱的河流》,无非是“海风”“山峦”“太阳”“星子”“蓝天”“鸽子”“大海”等与作者10多年来的新诗相重复的意象,而其他4首佚诗因为属于同一时期的作品,在意象上也少有突破。但是,宏观的判断,会遮蔽历史及作品的细节,一时一地的文学总归有当时的痕迹留在里面。所以,细读林庚刊于厦门的这几首新诗之后,也很难说没有厦门的痕迹留在里面。

林庚虽属闽籍,但其生于北京,成长过程中所受的教育和文化的熏陶,除了有家学渊源(乃父林志钧为著名学者和书法家),所接触的更多是以北京文化为主的北方文化,南方尤其是福建,对于其来讲,更多是一种意念中的故乡,从这个角度细审其“大海”“蓝天”等极具海滨风格的意象,或许是对祖籍故里的一种想象。但是,林庚对这些并无眷恋,反而是北平深秋之明净、爽朗,似乎更接近其气格。

所以也不难看到,林庚在厦门期间的诗作中,有一种过客心态,这一点在《绿的路》中有较为明显的体现,全诗第一段,似在写一位少年,经历了“世界的变换”(抗战胜利,从山城迁回鹭岛),站在东南一隅的海滨,眼前是同样因为“世界的变换”而来来往往的人群,于是眺望着鸽子低飞的“远方的城”(北平故都);第二段,则出现了邮箱和陌生的旅客,进一步揭示着期待北归的心态;最后一段,亦虚亦实,在

① 原载1948年9月《文学杂志》第3卷第4期。

厦门对山面海，借渔夫的梦寐追寻记忆。而《椅》似乎揭示了林庚在战后的心态转变，面对一切新的开始，正如面对一张新制的藤椅，“没有一个字适宜于题上”。

至于《自由的号手》与《复仇的日子》，诗风趋于刚健，更是对此前幽婉风格的丰富，尽情彰显了林庚论唐诗时所谓的一种“少年精神”。《自由的号手》中“山与草原的那边”“昔日的伙伴”，似乎也有暗指故都和故都的人们的可能，经历了长期的沦陷区生活，“他们正在被人遗忘”，所以用“带血的号声”呼唤生命。而另一方面，长汀山城对于沦陷的厦门来讲，依旧具有“大后方”的意义，所谓的“那边”的“伙伴”，又何尝不是林庚身处抗战胜利后的厦门，所做的呼号。此外，如果将《自由的号手》放在刊载它的《灯塔》月刊创刊号中来观察，林庚诗中的“号手”意象，也有其当下的深意。上文已经提到，《灯塔》月刊从创刊号开始就基本上定型了，很难实现之前预想的“提倡文艺”，只能是政论优先，而创刊号的文章基本上也是围绕“二战”后国内外形势及政治体制的讨论，总体上突出“民主”“民治”及“自由”等主题^①，而《自由的号手》恰恰与这些政论文章形成了一种广义上的“互文”。《复仇的日子》更是少有此前的幽婉，意象充满了野性，相比此前的创作，不能不说是一种自我突破。虽然有“吃饱了的蚊子的血”，这样的隐喻，但加上“复仇”“悲苦”“荒芜”“漫长的日子”来点题，这在林庚的新诗中基本上可以算作诗意显豁了，同时覆盖有一种战后的心理创伤。

三、《中国文学史·自序》初刊本辑考及其他

林庚在厦门期间的作品，除了有新诗散佚外，其《中国文学史·自序》的初刊本在此前也未被研究者注意，因为后来的初版本相较于初刊本有过内容上的增补，所以笔者更愿意将此初刊本也视之为一种“佚文”。

1946年五六月间，随厦大复员的林庚在文学活动之外，开始整理并出版被后人屡屡谈及的那部特色显著的《中国文学史》。这部著作于1947年5月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前有《朱佩弦先生序》（以下简称“《朱序》”）和林庚《自序》，而此后《中国文学史》一版再版，都是以1947年厦大初版本为底本印行的。所以，学界讨论这部著作时，涉及《朱序》和《自序》时，是以《中国文学史》初版本为根据，或者以《朱自清全集》和《林庚诗文集》为依据，对于《朱序》来讲，基本上不存在版本问题，因为《朱序》首次面世就是在《中国文学史》初版本，到了同年10月，只是添改题目后刊于上海《天文台》周报^②，次年又收入文集《标准与尺度》（上海文光书店，1948年），此后《朱自清全集·第三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将《标准与尺度》整本收入。对于《自序》的使用而言，目前都是以《林庚诗文集》或《中国文学史》初版本为依据，这便存在版本的使用问题了，因为《自序》不同于《朱序》，它在《中国文学史》初版本之前，就已经面世。简言之，《自序》其实有两个版本：初刊本和初版本。而问题恰恰出在这里，《自序》从初刊本到初版本，是有过增补的，所以，讨论问题是依据初刊本还是依据初版本，其背后是两个不同的时间背景和语境。

从此前学界涉及相关问题时对《自序》的引用来看，《自序》两个版本的差异，并未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所依据几乎是初版本。而《林庚诗文集》第9卷所附《林庚先生著作系年稿》1947年项下，明确说“5月，撰《〈中国文学史〉自序》”^[11]，可见，《系年稿》的编者亦将《自序》初版本后的末署时间，当成了《自序》最初的写作时间。笔者在查阅林庚在厦门期间的文献时，发现一篇题为《关于写〈中国文学史〉》的文章，署名“林庚”，刊于1947年2月28日《厦大校刊》第2卷第1期（以下简称“《校刊》”），这正是《朱序》中提到过的《关

① 如陈甫烈《论国民大会》、陈文藻《民治与教育》、炽夏《一个世界两个盘算》、炎《南京或北平？》、烈《美国政治之转向》、一端《瑞士怎样实施民主？》（译述）等文。

② 笔者所见为《天文台》沪版1947年第1卷第2期10月合刊。

于写中国文学史》。但是,《朱序》中虽有提及并引用,却并未说明出处,而此后的研究者在《中国文学史》中同时读到《朱序》和《自序》,看到《朱序》中所引述的《关于写中国文学史》中的句子,正是此后《自序》中的句子,则会下意识认为《关于写中国文学史》与《自序》只是改换题目的同一篇文章,或许此前有研究者已看到《厦大校刊》中《关于写〈中国文学史〉》一文,但未经细勘,依旧将之与《自序》当成是完全相同的文章。至于他们之间的差异,并未见到有研究者深究。

笔者将《关于写〈中国文学史〉》与《自序》作了校勘之后发现,《自序》是在《关于写〈中国文学史〉》的基础上增补了两段文字而成,其他地方并未作字句上的改动,所以,可以确定《关于写〈中国文学史〉》就是《自序》的初刊本。显然,《自序》并非是想再对初刊本的文字做润色,也并非只是在出版要求下将已刊的《关于写〈中国文学史〉》拿来换个题目当作序言,而是还想另有表达。

至于《关于写〈中国文学史〉》的写作时间,文末未署,但该期《校刊》的《编辑后记》做过如下交待:“本期稿件早于一月间编竣,正待付梓,适逢旧历新年,各印刷所循例休假一周,倘于复工后付印,势将延期,遂决定与二月份合并出版。”^[12]所以,此文写于1946年12月或次年1月初的可能性极大。因为此期《校刊》“一月间编竣”,编刊从收稿到统稿尚需一定时间,故不大可能写于1月中下旬;而据《自序》初版本交待,《中国文学史》第四章是厦大复员后所写,所以也不大可能写于是年秋天,毕竟写作此编也需一定时日。

此外,《编辑后记》还交待过这样一个细节:“本期因限于篇幅,有几篇稿件略加删节或临时抽出,事非得已,尚希作者鉴谅,并致歉意!”^[12]那么,林庚此文会不会在删节稿件之列?《自序》中增补的内容会不会是当时在《校刊》发表时所删去的部分?笔者以为不大可能。因为《校刊》栏目分为两类,学校的各种新闻报道、教务信息、院系介绍等内容,就占去2/3的版面,里面内容驳杂,可做删节的空间很大。其余1/3的版面,则属于《文艺副页》,专门刊登厦

大师生的文艺创作,而此期《文艺副页》,封面目录头条就是林庚此文,其余还有学生的作品,所以即便要挤出篇幅,也不至于到拿教授文章“开刀”的地步。而且,《自序》中增补的一段,提到了朱自清作序一事,更能说明《自序》并非恢复被删节的《关于写〈中国文学史〉》。

那么,从《关于写〈中国文学史〉》到《自序》增补了哪些内容,笔者校勘后发现,是以下两段文字:

文艺是领导人生的,但它并不就是幸福,然而我们的幸福能有其他的保证吗?我们愈是想保证幸福,幸福就常常离我们而去,正如同我们如果紧抱住和平,战争不久就会走来一样。人类的文明,在这一点上几乎没有进步。中国的儒家思想一直想保证人生,于是在儒家的手里人生就愈弄愈糟。愈想保证的,最后便必须放弃;因为那放弃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创作必具的条件。伟大的文艺时代,常产生在我们失去保证的时候。东周失去了西周从容的凭藉,于是有了大量《国风》的歌唱与楚辞;建安以来失去了汉代平静的生活,于是有了从五七言诗到宋词这一段时期。这历史的事实,将显示给我们人类文明的又一阶段,那也便是社会要向文艺学习的时候。

……(按,引者省)

这部书的前三编,民国卅年曾由厦大出版组以油印本装订成书,当时是用来发给班上的学生,并分赠与友人的。去年厦大复员后,计划出版大学丛书,并愿先印这一部文学史,因把第四编一并写出。书成,又承朱佩弦先生厚意写序,尤其使我十二分的感谢。此外,汪伯明校长与厦大出版委员会诸位先生对于这部书的好意,以及王云波先生在事务方面许多的帮助,使得这部书于印刷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形下,终能与世人见面,都在此敬表谢忱^[13]。

《关于写〈中国文学史〉》中,最后两段文字分别是《自序》的倒数第四段和倒数第二段,即从“所谓伟大的文艺正须伟大的时代……我则只要求那能产生伟大文艺的社会”一段,到“我写这部文学史……却可以给我们以更多的警觉”一段,这两段之间没有任何内容,到《自序》时,添加了上述“文艺是领导人生的……

那也便是社会要向文艺学习的时候”一段,又在文末添加了上述“这部书的前三编……都在此敬表谢忱”一段。

最后,还需要提及的是林庚在厦门时期继续他的“谈诗稿”写作。“谈诗稿”是林庚执教厦大期间(长汀)基于新诗教学而引发的产物^[14]。林庚北上后,于1947年9月至次年2月间在北京《新生报》副刊《语言与文学》中陆续发表了《谈“千年水未清,一代人先改”》《谈“高台多悲风”》《谈“黄河远上白云间”》等文,1987年4月其《唐诗综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其中“谈诗稿”一编中也收有早期的旧文,如《青青河畔草》《步出东门行》《短歌行》等。就笔者所见,这些文章中如《谈“黄河远上白云间”》^①《青青河畔草》^②二文,最初并非刊于《新生报》或收录于《唐诗综论》,而是刊于厦门地方报纸,极有可能是林庚随厦大复员后于厦门所作。当然,其他类似的文章,如《谈“千年水未清,一代人先改”》一文,目前所见最先发表于林庚刚回到北京不久的1947年9月,作于厦门的可能性也很大。

四、结 语

通过对上述林庚在厦门期间的史料及作品的辑考,总体可见在此期间的经历,不论是对林庚的文学创作还是学术研究而言,都具有较特别的意义。由于此前长期避居山城长汀,与外界较为隔绝,使得林庚的作品能够发表且实现与文坛沟通的机会非常有限,这其实从某种意义上压抑了其文学创作,而随厦大复员返回鹭岛之后,厦门相对稳定的条件为其创作及发表提供了较好的环境,加之战争带来的创伤记忆与即将到来的巨大的时代变革,使得林庚这一时期如《自由的号手》等诗作,开始介入对社会现实的思考与表达,在诗风上也从此前的幽婉走向刚健,这些对

于此林庚进入共和国时期的创作语境,具有一定的过渡作用。而作为文学史家的林庚,其最为重要的著作《中国文学史》写成并出版于厦门,特别是新见《中国文学史·自序》的初刊本——《关于写〈中国文学史〉》,与初版本《自序》是两个不同时空与语境的产物,涉及林庚与朱自清、王瑶在文学史研究中关于“诗”与“史”的对话。林庚北上后继续坚持着诗化文学史的研究路径,以及在厦门进一步对“谈诗稿”写作的展开,这些在其学术生涯中无不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 林庚.《林庚诗选》后记[M]//林庚诗文集:第9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138-139.
- [2] 林庚.新诗形式的研究[M]//刘涛.现代作家佚文考信录.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28-356.
- [3] 解志熙.考文叙事录: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丛[M].北京:中华书局,2009:156-157.
- [4] 关于《寤言》[N].星光日报,1947-11-25(4).
- [5] 本校教授陈烈甫等创办《灯塔》月刊将于卅六年元旦与读者见面[J].厦大校刊,1946,1(8):15.
- [6] 林庚.绿的路[N].星光日报,1946-09-16(4).
- [7] 林庚.椅[N].星光日报,1946-11-11(4).
- [8] 林庚.自由的号手[J].灯塔,1947(1):12.
- [9] 李牧.林庚集外佚文考述[J].粤海风,2020(4):62-69.
- [10] 徐学.厦门新文学[M].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95.
- [11] 林庚先生著作系年稿[M]//林庚.林庚诗文集:第9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322.
- [12] 编辑后记[J].厦大校刊,1947,2(1):24
- [13] 林庚.自序[M]//林庚.中国文学史.厦门:国立厦门大学出版社,1947.
- [14] 林庚.谈诗稿序[J].宇宙风,1943(130):253.

(下转第92页)

① 《谈“黄河远上白云间”》最初刊于1947年4月13日厦门《中央日报》副刊《中央副刊》(第458期),原题为《黄河远上白云间》,署名“林庚”。

② 《青青河畔草》最初刊于1946年9月26日厦门《星光日报》副刊《艺文版》(第6期),原题为《青青河畔草》,署名“林庚”。

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200.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1：129.

[7] 吴锡璜. 同安县志 [M]. 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603.

[9] 孙尔准，陈寿祺，程祖洛. 道光重纂福建通志 [M].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506.

[8] 陈支平. 近 500 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 [M].

The Culture of Southern Fujian and the City Memory in
Xiamen Zhi during Daoguang Period

HE Li, CHEN Lin-yu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Languages, Xiam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Xiamen 361021, China)

Abstract: *Xiamen zhi*, compiled by Zhou Kai during the Daoguang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is a local chronicle with rich citations and complete styles. It record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rules and regulations, and governance of Xiamen in great detail, and reflects strong local characteristics in such aspects as arts, customs and urban construction.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and analysis of *Xiamen Zhi*, the elements of Southern Fujian culture and urban memory can be extracted, which reveal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Xiamen and helps reader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urban culture of Southern Fujian.

Key words: *Xiamen zhi*; culture of Southern Fujian; city memory

(责任编辑 陈蒙腰)

(上接第 83 页)

Textual Research on Historical Materials, Compi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Lost Works of Lin Geng during His Stay in Xiamen

LIU Rui

(School of Liberal Art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The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relevant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Lin Geng during his stay in Xiamen (from June 1946 to July 1947) is basically blank in the previous study of Lin Geng. During that period, Lin Geng not only insisted on literary creation and academic research, but also made a collective appearance of his new poetry education achievements in local newspapers. After that, he participated in the initiation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 monthly Lighthouse. In addition, the excavation of three new poems in Xiamen local newspapers, the recompilation of the article “On Writing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e discovery of “Talking about Poetry Manuscript” published in Xiamen, provide important first-hand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Lin Geng’s literary creation and academic thought, and also have certain historical value for the study of Xiamen local literary and academic history.

Key words: Lin Geng; during his stay in Xiamen; textual research historical material; compi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lost works

(责任编辑 张永汀)